

云霞

蔺大云◎著

之歌

YUNXIAZHIGE

序

一

为了记录下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命运中的悲欢离合以及生活里的喜怒哀乐；同时，在近40年的工作经历中，也有不少切身感受和体会。

为了刻画下人生轨迹，给亲友们留个纪念，我仔细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下每个阶段的重要事件，自己的心声、亲身体验和真实感受。

“四次抉择”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人生的旅途上，有很多的十字路口，当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上，都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抉择是对自己信念的追求；抉择是对人生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而抉择的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无怨无悔的代价。只有抉择对了，方向对了，你的人生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这一生，选择了冲出封建牢笼，选择了投入革命怀抱，选择嫁给“最可爱的人”，选择奔向首都北京，看来基本上都抉择对了。我的人生道路，虽然有曲折，有坎坷，但风雨之后见彩虹，我庆幸我的人生是幸福的。

二

自1972年至今，我从国务院原内务部调湖北省政法部门工作后，已在武汉工作、生活了四十余年。由于工作需要，出差、调研、考察较多，接触面较广，感触颇多。特别是退休之后，同老伴一道游山玩水，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赏心悦目，心潮澎湃；亲眼目睹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豪情满怀，思绪万千。即兴之作，大都已记录下来，共计180余首。晚年又学会了电脑五笔打字，兴头之余，全部打印出来，留作纪念。

“时代颂歌”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自己在当时的精神面貌及心声。

三

毛泽东诗词是诗词中的“泰山”、“北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它反映了新中国建国前后的革命史实以及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远大理想不屈不挠、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是一部中国革

命和建设宏伟的壮丽史诗。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前任会长贺敬之同志有过精辟的评价：“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情操、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迈奇美的艺术想象、高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

毛泽东诗词展现出宏伟的气魄，远大的目光，深邃的睿智以及博大的胸怀，令我对毛泽东诗词无比崇敬，无限欣赏和极其赞颂。我于2004年申请加入了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荣幸成为会员，感到十分兴奋。

通过撰写有关毛泽东诗词的论文，曾先后到重庆、合肥、武汉、银川参加过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的四次年会，我将自己所写的几篇论文，汇集成“赞《毛泽东诗词》”。在有生之年，我将矢志不渝地热爱毛泽东诗词，诵读毛泽东诗词，学习毛泽东诗词，钻研毛泽东诗词，抒发爱国、爱党情怀，以此激励自己奋勇前进。

人生旅程

人生，经历着悲欢离合，
充满着喜怒哀乐。
只有乐观、自信、向上，
满怀希望历尽人生之路，
才是幸福的人生。

人生，对宇宙而言，是十分短暂的。然而，对个人来说，却是一个较长的旅程。大云这一生，概括而论：童年是纯真的，充满着幻想；青年是快乐的，充满着希望；中年是曲折的，充满着自信；晚年是幸福的，充满着欢乐。

一、纯真的童年

出生于烽火硝烟年代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自行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即在几天之内，侵占了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日军侵占了沈阳，又陆续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1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亡国奴的痛苦。“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国人民抵抗日军侵略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

正是在这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1931年12月，我出生在四川省涪陵县的一个小镇—蔺市镇。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曾留学日本，学美术、绘画，回国后在上海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靠当教员、图书管理员维持家庭生活。母亲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整天操持家务，照料儿女，十分能干。我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由于父母的出身和经历影响，加之他们的性格比较豁达开朗，给家庭带来一定的民主、宽松和爱心。在

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虽然生活在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六位姐弟也算侥幸茁壮地成长起来。

家里经济条件并不算好，属于小土地出租者，有薄田十余亩，勉强能维持生活。但在我初中毕业时，由于父亲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将田产卖掉一多半，最后连在镇上祖传的几间房屋也卖掉了。我们全家只得搬到离镇子二十多里路的乡下居住，过着十分清苦贫困的生活。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旧袄旧衣，经常是年龄大的子女穿旧的衣服，让弟弟妹妹接着穿；冬天的棉袄，天暖了就拆去棉花当夹衣穿。当时我只有14岁，因为我是老大，时常要帮助妈妈洗衣、烧火、做饭，弟妹们主要是拾柴火。记得有一次我去挑水时，走在一条狭窄的田埂上，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在水田里，挣扎了好半天才爬起来。平时到镇上买些家庭日常用品，来回也需要走四十多里高低不平的小路。母亲为了节约开支，在屋后搭一个猪圈，喂养了两头小猪，还开辟了一块小菜园。我最小的一个妹妹长到5岁时，由于家境实在困难，难以维持生计，就将她送给一个姓张的农民作了养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环境的艰辛，我和弟妹们都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奋发向上，努力读书，力争跳出农门，改变现状，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前程。

生活历练中成长

我出生的藺市镇，地处长江沿岸，依山傍水，绿树成荫。我家院落后面有一棵粗大的黄桷树，遮天蔽日，一到炎热的夏天，老老少少，都围坐在大树下乘凉，谈天说地。小镇就在长江边上，每年冬天，江水十分清澈，但一到夏天江水上涨，泥沙泛起，江水变得十分混浊。当你站在半山坡俯视长江，就像一条黄龙从眼前飞驰奔腾而过，十分壮观。市镇郊外，有一大片庄稼地，每年春天油菜花开时，像一幅幅金黄色的绒毯，铺满大地，散发出阵阵清香。市镇郊外，紧靠长江，屹立着一座龙门大桥，长一百多米，宽十余米，由三个大的拱圆形桥洞支撑建成，显得十分庄严宏伟。人们如果乘坐在江轮上，远远就能看见这座古朴的建筑，龙门大桥已成为藺市镇的标志性招牌。镇上横向竖向有不长的两三条街，依坡地而建，街道较整齐，商业繁茂，生意兴隆，蕴藏着无限生机。

我家算是书香门弟，父亲和母亲都是知书识理，诚信待人，与族人、邻居和睦

相处。我家有一柜子父亲购买的各式各样的书籍，品种齐全，名目繁多，我和二妹将它们当成宝贝，一有空就躲到阁楼里去看书。李大钊曾说过：“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我们两姐妹都热爱读书，尤其喜爱文艺方面的书籍，这对我们一生中性格、兴趣、爱好的形成，以及人生理想、信念的奠定，影响较大。由于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文学作品的熏陶，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历练，我在12岁时，已成长为一个早熟的女孩。比较懂事，善于观察了解别人，也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由于自幼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养成一副侠义心肠，富于同情心，好打抱不平。同时，由于家境的变迁，经济和生活环境比较恶劣，又形成了我奋发向上、出人头地的思想和不服输的性格，一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环境，创造美好的未来。记得还在读小学时，我就曾暗自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超过蔺家所有的男孩子。

举家搬到偏僻的农村之后，童年的生活虽然贫苦，但精神上却是快乐的。我曾和弟弟、妹妹一起赤着脚，提着小桶，沿着山溪的河沟，搬石块，掏泥洞，抓螃蟹；一起爬树，摘果子吃；一起看夕阳西下时的彩云，随着云彩的变化，我给他们编造一些梦幻般的神话故事，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曾经一起在夏天的星空下，和两个妹妹躺在宽大的圆形竹簸箕里，乘凉、唱歌、讲笑话、猜谜语；一起在清澈见底的清溪沟里水、泡脚，看着小鱼儿无忧无虑地往来穿梭。

我自幼读书很用功，也颇得法。我喜欢数理化，也喜爱文学，还喜欢音乐、体育、绘画等等。总之，兴趣比较广泛。我十分崇拜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从小就想当一名中国的居里夫人。为了改变环境，创造未来，我对学知识越来越有兴趣，自己在学习上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学习中深切体会到：学习重在平时，上课认真听讲，力求理解领会；又快又好地完成作业；勤思考，多钻研，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弄懂；博览群书，丰富知识，触类旁通；虚心请教，多写多练。我读书虽然很用功，其实我玩得也很痛快，我的兴趣爱好特别广：打球、踢毽子、捉迷藏、唱歌、跳舞等，什么都玩。我的口头禅是：大考大好耍；小考小好耍；不考不好耍。我记得列宁曾经说过：会工作的人会休息，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同样，我也得出一个结论：会学习的人会玩，会玩的人才学得好。

由于学习刻苦，方法对头，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记得在涪陵县女中举行的初中毕业典礼上，当校长在大会上宣布：蔺大云同学学业成绩第一名、操行成绩第一名、体育成绩第三名时，全场热烈鼓掌。学校的老师都主动拥向我的父亲（父亲当时在县女中任教，是地理课和图画课老师），祝贺他：“你家出了一位女才子”，“你有这么聪明好学的女儿真叫人羡慕”。那一天，我和我的父亲都感到十分荣耀和快乐。

第一次抉择—冲出封建牢笼

生活在半封建的旧社会里，尤其是在乡镇农村，对女孩子而言，到处是火坑和陷阱。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以及要求“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三从四德”的封建观念。还有各种压迫妇女的陈规陋习，妇女们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抬不起头来。我亲眼看见我的一位堂姐，结婚后就走进死的边缘，她是那样的朴实、善良，小心翼翼地侍奉公婆，侍候丈夫和小姑子，但却受尽虐待，最后被逼得上吊自缢了。我还有一位堂嫂，是我读初中时涪陵县女中的校花，她与我的堂兄结婚之后，就由一位天真活泼、美丽可爱的姑娘，变成为一个侍奉公婆、丈夫、小叔子和小姑子的呆滞的奴隶和木偶。她们悲惨的命运给我以启迪，我认为，封建礼教是杀人不见血的，结婚就是进坟墓。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为自己的前途而奋斗；一定要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创造自己光明美好的未来。

1945年夏天，在我初中毕业之后，由于父亲抽大烟，卖房卖地，已无钱供我继续上学，我面临失学的境地。大约一年后，有一位姓邹的远房亲戚，在成都市开人力车行，家境颇富裕，他们老家就在离蔺市镇不远的南坪山上。老两口想为大儿子寻觅一位贤淑的儿媳，他们嫌都市里的女孩子太娇气，就拜托他家的侄儿媳妇在老家寻找一位合适的儿媳。事情真凑巧，她的这位侄儿媳妇，恰好是我读初中涪陵县女中的训育主任。她知道我在初中时期的优异表现，就主动向他们推荐，说我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很适合选作未来的儿媳。

时间不长，为儿子找媳妇的母亲和姐姐，就远道从成都赶来我家相亲。当时我并不知情，她们先同我的父母交谈后，又找机会见过了我本人，表示很满意。返回

成都后，立即写信来提亲，并附上大儿子的一张相片。信中特别提到：如果家庭经济有困难，可以资助我上高中，上大学；并建议我到成都去念书，说省城里的教育质量好。我的父母思想是比较开通的，收到信后，立即将信和相片给我看了，问我同不同意这门亲事。

当时我只有15周岁，却很有主见地对父母说：“只要我有机会能继续念书，无论他是怎样一个人，我都愿意去。”自己心中暗喜，这下可有机会离开这个古老的乡镇，跳出封建的火坑了。

在双方家长都表态同意之后，1947年春，父亲就亲自送我去成都。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父亲和我带着简单的行装，离家远行，逆水而上，乘坐了一昼夜的轮船。到达重庆后，住了一晚，再乘坐两整天的长途汽车，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最后总算到达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市。在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里，见到了对象邹的父母、3位姐妹、3个弟弟和他本人。我被安排在院落西边的一间明亮整洁的屋子里。我的父亲也通过他家一位堂哥的关系，被介绍到四川省图书馆当了图书管理员。从此，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朝气蓬勃的青年时期

考上了著名的树德中学

到达成都后几个月，正值1947年秋季招生，我报考了成都市学业成绩优异、声名卓著的树德中学。发榜那天，我兴冲冲地到学校去看榜，惊喜地看到，我竟名列榜首，中了状元。这下子让邹家全家老少惊叹不已，没想到这个农村来的小姑娘，竟考上了成都最有名的学校，而且还考了第一名。大家都认为，这个未来的媳妇选得好，选对了。邹家大少爷对我也十分钟爱，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

我读高中的费用全部由邹家供给。当时正值成都市解放前夕，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快垮台了，发行的货币银元券、金元券大幅贬值，我每学期的学费，都是由邹家直接送大米去交。父亲因工资微薄，加上货币贬值，每月给我的零用钱，只够买两个烧饼。

树德中学分男生部和女生部，我在树德中学读书期间，对数理化情有独钟，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兴趣，形成良性循环。每学期的成绩都很优秀，数理化及其他

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我还爱好各种体育运动，对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都感兴趣。通过参加体育活动，不仅增强了体质，而且密切同学间的交往，增进了友谊。三年的高中生活，吃住都在学校，寒暑假回邹家住。星期日，对象邹也陪我去看电影、逛逛公园。他还在成都市少城公园的一块草坪上，教会我骑自行车。邹对我十分关心体贴，我住校时，他将自己盖的丝棉被，送到学校给我盖，我很受感动。在树德中学读书期间，我交了不少好朋友，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学习、谈心、玩耍，参加各种球类活动，生活过得愉快充实，内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和幸福。

迎接解放

解放前夕，我们同全市的青年学生一道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进步歌曲，斗志昂扬，气氛热烈，充分表现出青年学生想要粉碎旧世界、迎接新时代的热情和愿望。1949年12月下旬，四川省成都市迎来了全国最后一个大城市的解放，同学们都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们学生排在大街两旁，举着小红旗和横幅标语，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庆贺全国人民获得解放。

解放后的新中国，虽然面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破烂摊子，困难重重，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毫不气馁，勇往直前，承担起改朝换代的繁重任务。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直至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所有这一切，人民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中国共产党正逐渐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敬佩。

我作为解放后的青年学生，睁大了好奇的眼睛，重新审视这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充满了激情与向往。同时，涌现出一种向命运挑战、尽可能改变自己前途和命运的强烈愿望。在树德中学高中毕业班的日子，我和十几位同学，办起了《慧光》墙报周刊，宣传解放后的新气象、新思想和新生活，表扬好人好事。闲暇时，男女同学在一起唱歌、打球、做游戏，甚至一块儿到郊区小河里游泳。毕业前夕，我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生机、希望和欢乐，有如春风化雨，自由自在地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第二次抉择—投入革命怀抱

1950年夏天，我结束了高中时代的学生生活，并报名参加了成都军管会在华西坝举办的暑假青年学园。华西坝是华西大学的校园，大片大片的绿茵草地，点缀着若干棵树叶浓密的参天大树，加上许多欧式建筑，环境十分优美。参加学习的青年们，认真听军代表作报告，讲革命道理；然后分成若干小组，围坐在树荫下，进行学习、讨论；教唱革命歌曲，做游戏，看幻灯影片，生活丰富多彩，青年同学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憧憬。

在暑假青年学园学习期间，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前途。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是依赖邹家的资助，继续念书，上大学。这就意味着经济上还要继续依赖别人，不能自立，命运就不可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自力更生，参加革命队伍，到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这就意味着要自立、要奋斗，创造自己的未来。我思考再三，最终选择了后者—走自己向往的道路。暑假青年学园学习生活结束后，我立即报考了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很快被录取了。新的环境、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学习生活就要开始了，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改造自己、变革社会的革命浪潮中去。

革命大学，是改造知识分子的熔炉，也是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场所。西南革大的校址设在成都市的一座旧庙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进校之后，首先是打扫庭院和宿舍卫生；然后编队编组；每人发一套深灰色的棉军装和两套灰色单军装，还有灰军帽和解放鞋等。并下令立即着装；吃大锅饭（八个人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放一脸盆盛的大锅菜，蹲在地上吃）；听大课，由军代表作报告，讲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树立革命世界观和人生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等；然后是分小组、联系实际进行讨论。

参加革大学习的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还有少量社会青年，目的是为新中国的各条战线培养干部，以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在学习讨论中，大家都十分认真，密切联系个人的家庭状况，思想实际，谈认识，谈感想，并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老区来的解放军战士，担任各中队的干事，组织办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管理生活、卫生等。各中队都办有墙报，刊登学习心得，表扬好人好事。我因为爱好

写作，被推选为中队墙报的主编之一。西南革大在每次作大报告之前，全校各大队学员集中之后，就自发地大唱革命歌曲，各大队互相拉歌，情绪激昂，热闹非凡。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我感到思想很充实，对前途和生活充满了信心，也可以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社长西戎

革大学习结束后，我们都在革大等待分配工作，省、市、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派干部赶到革大来挑选人。大概是我曾在革大中队编过墙报的原因吧，我和另外四位革大的同学，被《川西日报》报社来的人挑选上了，通知1950年12月5日，正式到报社人事处报到。

我们五位革大的同志报到后，被分配去创办《川西农民报》。报社社长是西戎同志。他曾同马烽合著享誉全国的《吕梁英雄传》一书，是知名的作家。西戎同志其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完全是靠自身的勤奋和刻苦学习，加上丰富的革命战斗生涯，才能写出那样生动感人、成功塑造英雄人物的作品。西戎个子不高，有一张平常而又朴实的面孔，当时30岁左右，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他带领着我们这群年龄20岁左右的小编辑，就像带着一群小弟妹，对我们十分亲切，生活上十分关心，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写作。他找来柯蓝写的《怎样编写通俗报刊》和吕叔湘写的《语法与修辞》等，组织我们一起学习、讨论，提高大家编报的业务知识水平。

1951年初，成都召开“川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西戎是人民代表，报社派我和另一位编辑易元祥去参加会议报道。看到数百人这样大的场面，我俩真不知如何着手。西戎提出让我们去采写一篇《翻身农民的喜悦》的报道，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10多个小时，总算写完了报道初稿。可是送给西戎同志一看，他皱了皱眉头，很幽默地说：“你们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树德中学的高材生，怎么写出这样水平的特写，难道你们在采访中，一点都没有受到感动吗？”我们两人被说得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最后还是由西戎同志执笔重写，署名仍是我们两个小青年的名字，文章见报后，大受好评。

《川西农民报》编辑部共有8名编辑，除革大选调的5人外，还从川西日报社调来一位主编，又从外地调来一位副刊编辑，连同西戎同志，8位新老干部组成一个

十分团结、和谐的群体，在西戎同志的领导下，愉快地工作和生活。1953年春，西戎社长被调到四川省文联任主席，后又被调回山西省任文联主席。对于这样平易近人，又十分关心同志，并善于教育青年的好领导，我们十分怀念。

培养多面手

《川西农民报》编辑部由于人少事多，为了弥补人力的不足，挖掘潜力，同时，又可以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成为多面手。编辑部采用了编（编辑）、采（采访）、通（通讯联络）合一的工作方法，每个人在家编辑一段时间稿件，搞一段时间的通讯联络工作，再作为记者到地、县、农村去采访。这样，个个都能担当起各项工作，人人都成为多面手，工作就主动了。记得有一次派我到广汉县去采访，还闹了一个笑话。当时我留的是运动员短发，身着灰军服，戴着灰军帽，脚下穿一双草鞋，自己背着捆好的被盖卷，自带介绍信到县招待所去联系住宿。接待室的一位女同志将我上下打量了许久，最后问我：“你到底是女同志还是男同志？”惹得我笑弯了腰。我回答说：“当然是女同志。”还有一次，派我去采访赴朝慰问团的一位女农民代表。她到朝鲜前线，不仅去慰问了“最可爱的人”，并且还同她的未婚夫在前线举行了婚礼。我同她攀谈起来，她十分高兴地告诉我：祖国的亲人们在前线受到极其热烈、极其隆重的欢迎；她又同心爱的人组成美满的家庭，她感到无比快乐和幸福。采访结束后，我写了一篇通讯报道，还受到社长的表扬。

1953年春，《川西农民报》编辑部与川东、川南、川北3个农民报社编辑部合并，成立了《四川农民报》，由山西的一位老干部李半黎同志担任我们的社长。半黎同志也是一位很有文学素养、十分风趣的人物，他写得一手好书法，同青年人能打成一片，大家都很尊敬他。

朝气蓬勃的集体生活

四川农民报社和四川日报社是一个党委，一套行政机构，吃住都在一起，只是编辑部是分开的。解放初期，两个报社编辑部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未婚的男女青年，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工作上有干劲、有闯劲。报社的集体生活是既紧张，又轻松愉快的。上班时，忘我地工作，经常加班加点，大家从没有怨言。下班后，一起打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下象棋、围棋；星期六晚上跳交谊舞；星期日除看

书、睡觉外，有时还到成都郊外的小河沟里游泳。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吃饭、穿衣都是大包干，每人每月只发几元零花钱，女同志多五角钱的卫生费。每到节假日，大家就去“打平伙”（即每人出一样多的钱，一起去吃成都市有名的小吃）。

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无忧无虑，充满朝气和快乐，令人难以忘怀。

两个报社的领导同志都是南下老干部，他们对工作极其负责，处处以身作则。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们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的战斗洗礼和磨练，不少老同志遍体鳞伤，伤病经常折磨着他们。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强忍着伤痛，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天明。每当我从他们灯光不灭的窗前走过时，我的眼眶里总会饱含着感动的热泪。这大概就是身教胜于言教的普遍真理吧！

报社的党团活动坚持经常开展，及时学习党的文件，组织讨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定期组织团日活动等。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成都市郊区郫县过团日，参观了二王庙和都江堰。李冰父子兴修水利的伟大功绩，令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他父子俩的聪明才智，令我格外敬佩。都江堰的两岸，是用竹子编织成竹笼，再装满鹅卵石，然后将竹笼堆砌起来筑成堤坝。这样的堤坝不易腐蚀，十分坚固耐用，再大的河水冲击都不容易溃堤，既能防洪、灌溉，又省工、省钱。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真可谓是才智高超的水利工程师。当我们走在摇摇晃晃的索桥上时，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全体共青团员和青年们还在二王庙和索桥上合影留念。

第三次抉择—嫁给“最可爱的人”

在报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的婚姻恋爱问题却出现一些波折。早年由家庭给我订婚的对象邹，解放前在重庆四川省教育学院读书，重庆解放后，1950年1月他也离开学校，考取了在重庆南温泉举办的西南军政大学。学习一年之后，全体学员都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即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投身于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此次变动，邹未曾写信告诉我，大约有两年多时间，音信全无，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恰巧在这段时间里，我被调到时事组工作。时事组有一位姓张的编辑，对我很有好感，当时，相处在一个单位里，交谈的机会较多，志趣相投，彼

此很谈得来；加之张对我生活上十分关心体贴，因而逐渐产生了一定感情。

在两年时间里，对象邹的音信杳然，却在1952年秋天，突然从黑龙江省安达县医院给我寄来一信。信中说他在朝鲜前线受了重伤，手和脚都断了，现在正在安达县医院治疗和休养。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怎么办？何去何从？选择谁？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与情感世界的斗争十分激烈。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我终于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最可爱的人”（当时魏巍写了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通讯报道之后，全国都将志愿军称作“最可爱的人”）受到伤害。我当即给邹写了一封极其热情的回信，除了安慰和鼓励他安心养伤、争取尽快康复外，还表态说：“你的手脚断了不要紧，我的手就是你的手，我的脚就是你的脚，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1953年春，老邹从黑龙江回到四川，被安排在大竹县第五荣军学校校长办公室工作。他给我来信说，他已回到四川，并告之：他的手和脚并没有断，只是右大腿负了伤，右手无名指断了一节。在黑龙江安达县医院评伤残等级时，还发扬风格：本应评为三等甲级伤残，他却自动减报为三等乙级伤残。我接信后，既高兴又感动。同年6月下旬，老邹事先并未与我联系，自己带了一封第五荣军学校组织上写的结婚介绍信，赶到报社来，说要马上结婚。对“最可爱的人”的要求，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于是我们商定：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举行简单的结婚典礼。

婚礼办得很简朴，但却异常热闹。社长为我们主持婚礼，报社的同志们送来了对联和年画；妈妈给我买了一口小皮箱、一床棉被和两个枕头；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些糖果、瓜子和花生。就在一间临时布置的新房里，社长正式宣布我俩结婚，并组成小家庭。同志们热烈祝贺，让我们介绍恋爱经历、欢迎我俩唱歌、说笑话、逗乐。我还记得当时老邹唱了一首很雄壮的歌，歌词前几句是：“热血滔滔，热血滔滔，像江里的浪，像海里的涛，常在我心中翻搅，只因为耻辱未雪，愤恨难消。”婚后第四天，老邹即返回大竹荣军学校。

为了照顾夫妻家庭生活，老邹请求组织上调我去大竹荣校工作。经双方组织协商同意后，荣校给报社发来我的工作调动函。我考虑到在报社与张经常见面，彼此

感情上都增加痛苦，就同意调到荣校去工作。

特殊的学校

1954年7月，我离开成都市，乘坐长途汽车，经重庆去大竹县。到达荣军学校时，受到老邹和他的战友们的热情欢迎。由于我在报社工作过三年多时间，对国家大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较熟悉，领导上决定安排我担任政治教员，后又兼任语文教员。面对这些“最可爱的人”，他们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作出过贡献的伤残战士，有的失去大腿拄着双拐；有的只剩下一只眼睛戴着墨镜；还有的内伤至今尚未痊愈；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一张张朴实憨厚的面孔，热切地渴望着你带给他们知识，增长才干，丰富他们的人生。我从内心里涌现出一种冲动，决心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

荣校这个大家庭，生机勃勃，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荣校的正副校长都是老红军，尤其是索应礼校长，身经百战，全身都有枪伤。但为了党的事业，他不辞劳苦，肩负起教育和管理的重任。他生性耿直，爱憎分明，组织纪律严格，政治思想强，在学员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学校的师生关系也十分融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学员们由于年龄大，又受过伤，学习中困难不少。但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克服困难，刻苦学习，付出了比一般青少年学生更多的艰辛和心血。除了上课时间外，学校还组织比赛篮球、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每当比赛各种球类时，许多师生都在一起围观助阵，呐喊助威，格外热闹。星期六晚上，教职员工还在一起跳交谊舞、唱革命歌曲，生活中充满着激情和青春活力。

四川是天府之国，在解放初期50年代，物资非常丰富，但由于交通闭塞，很难运到省外，因此物价十分便宜。我们生活在大竹县城里，就更加便宜，一个鸡蛋才卖2分钱，花1角钱就能吃一大碗鳝鱼面、猪肝面；广柑（即甜橙）半分钱一个，伍角钱可买一百个。我们每人每月只交9元钱的伙食费，8个人一桌，肉食、蔬菜起码有八大碗，价廉物美，十分丰富。自1953年由供给制改工资制后，因我和老邹都是家里的老大，每月的工资，除留下伙食费和购置日常用品的费用外，其余都分别寄给两个家庭，供弟弟、妹妹们念书。

双喜临门

1955年4月23日，我十月怀胎，生下了可爱的大女儿晓松。晓松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当我预产期满后，即住进大竹县医院，结果是等了一天又一天，预产期延长了十余天。生产前，我每天喜欢在医院附近散步，医院外面有一片松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尤其是清晨，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松树那高大挺拔的枝干，坚强屹立，不畏风寒，执着向上，真正展现出松树的风格，令人肃然起敬。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也像清晨的松树一样：坚强、勇敢、正直。因此，我给大女儿取名晓松。晓松一生下来就十分可爱，黑黑的头发长长的，盖过了耳朵，是个聪明可爱的小女孩，她给父母带来无比的喜悦和快乐。

56天的产假期满后，我请了一个保姆带晓松，立即投入紧张的教学工作。由于我工作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学员们进步很快；我又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组织纪律性强，追求上进；并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群众关系良好。我提出入党申请后，即由校党委副书记夏大宾和办公室党支部书记杨彦亮作为介绍人，经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校党委批准，我于1956年7月1日正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参加入党宣誓时，我暗自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起模范带头作用，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第四次抉择——奔向首都北京

50年代的新中国刚建立不久，需要大量有较高文化知识和科学技能的干部。为了培养提高青年干部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中央政府下令大力推行调干学习。即青年干部可以停薪留职，离职去报考大学，学习结束之后，仍可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我考虑自己仅是高中学历，很想充实知识，提高学历，就自愿申报了调干学习。于是，在1956年炎热的夏天，我只身从大竹县出发，乘坐长途汽车到重庆去报考大学。由于我原来学习的基础较好，经过考试，最后被西南师范学院英语系录取了。事情真凑巧，就在我准备去重庆念书时，国务院内务部却发来了工作调动函，要将我和老邹在内的5位同志调北京国务院内务部工作。因为大竹第五荣军学校隶属于民政系统，内务部委托四川省民政厅挑选干部，荣校就将我们五位同志推荐上去，未曾想到竟被批准上调内务部。

是去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呢？还是到北京工作呢？虽是双喜临门，但却上下两难

。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正如思想家孟子《告子上》文章中所写：“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经过反复认真思考，还是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占了上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天安门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我曾梦寐以求地想去看看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宝藏丰富的故宫和风景秀丽的颐和园，还有那巍峨雄伟的万里长城。今天竟有这样的机会，我能放弃吗？

决心下定之后，我们一行5人，匆匆准备行装，荣校为我们开了欢送会，并照相留念。我和老邹又专程将刚满一岁半的女儿晓松，送到成都她爷爷家里托养。我们5人怀着无比兴奋、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奔赴首都—北京。

从重庆乘轮船顺江而下，经过有长江天险之称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峡给我们留下极其雄伟壮观的景象。一座座巍峨险峻的山峰，一面面古朴苍老的石壁，还有奔腾湍急的惊涛骇浪，从眼前飞驰而过；赤胸露体的纤夫，唱着悲壮悦耳的歌谣（当地称“喊号子”），弯腰屈背奋力拉纤。这番景象，不仅让我想起诗人李白著名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长江自宜昌以下，河床舒展开来，浩瀚的江波坦坦荡荡，古老而陈旧の木船飘浮在江面上，偶尔驶过一艘轮船，掀起雪白的浪花。所有这一切，就像一幅幅雄浑俊美多姿多彩的油画，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到达汉口后，我们五人换乘京汉铁路列车，直奔目的地—北京。第一次乘坐火车，感觉很奇妙：沿途的山峦、村庄、河流、树林、庄稼。

就像放电影一样，飞快地一闪而过，转瞬即逝；火车的速度就像在和时间赛跑，似乎在鼓励你勇往直前、奋发图强。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在华灯初上时，我们到达了首都北京。乘坐在公共汽车上，看见西长安街上灯火通明，笔直宽敞的马路两旁，白杨树排列整齐；路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到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还有悬挂在城楼正中的毛主席和孙中山并列的画像，我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内心感到无比幸福，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50年代的北京城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又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50年代的北京